



中國革命史話

1919—1949

第二卷 东亚朝暉

主編 夏以溶 副主編 趙迎生

汪丰敢 刘一民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话

1919 - 1949

第二卷 东亚朝晖

主编 夏以溶 副主编 赵迎生

汪丰敢 刘一民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湘) 新登字 006 号

zhōng guó gé mìng shǐ huà
中 国 革 命 史 话

东亚朝晖

汪丰敦 刘一民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1.8万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6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熊楚健

封面设计:郇 渊

印数:1—52,000

ISBN7—5358—1112—4/I·340(儿)精装定价:14.40元

平装定价:9.10元

书名题字：江泽民

中國革命史話

继承革命传统
开创历史新篇

为中国革命史话卷

胡绳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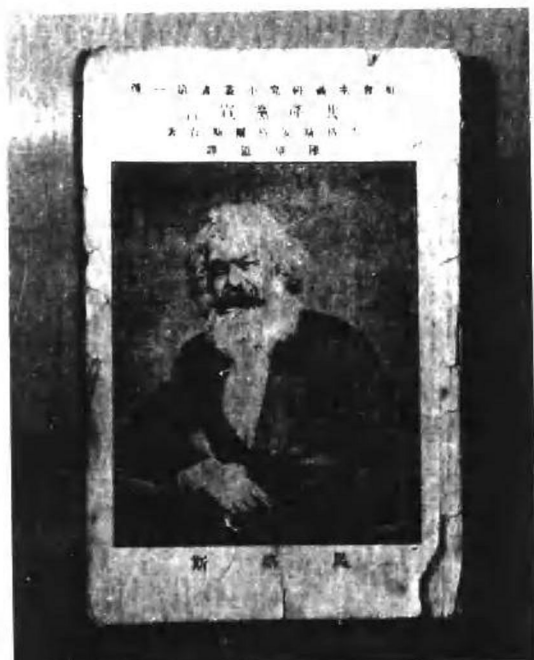


北大红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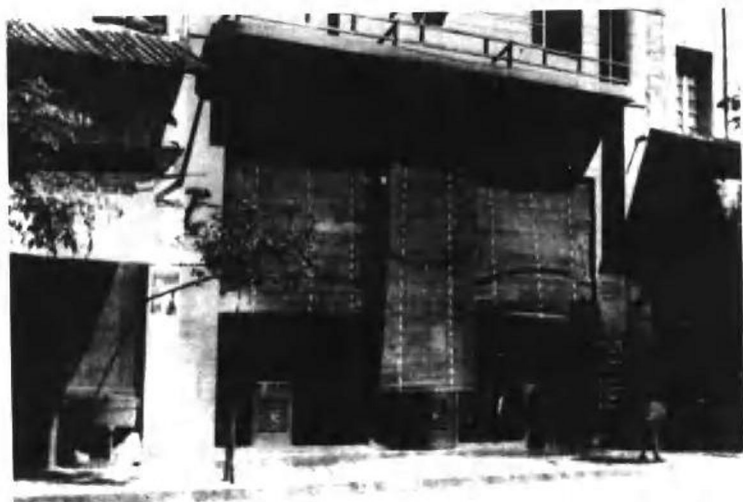


《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北池子
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1917年,《新青年》杂志由上海迁往北京。图为坐落在北池子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陈望道恭译《共产党宣言》。图为同年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长沙文化书社旧址。

勞 働 者

第一號 第一卷 第一期

第一號



總編輯廖正興 州縣七第 報民

民國九年十月三日出版

1920年10月，
工人刊物《勞働者》
在广州创刊。图为
《勞働者》创刊号。



受共产国际委派，于
1921年来到中国帮助建
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
际特使马林



中共一大会议旧址。



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因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而中断，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图为该游船的复制品。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北大红楼传真理 亢慕义斋译文章·····	(1)
第二十二回	伸正义仲甫出狱 别同志守常送友·····	(14)
第二十三回	柏公馆独秀暂寓 三益里四杰同趋·····	(27)
第二十四回	吴廷康北京访问 共产党上海定名·····	(41)
第二十五回	三次论战思想界 一朝分裂《新青年》·····	(56)
第二十六回	陈望道全译《宣言》 渔阳里初建“小组”·····	(69)
第二十七回	北京城守常当选 济南府少年奋争·····	(84)
第二十八回	蔡和森巴黎寄言 毛润之长沙立党·····	(98)
第二十九回	《劳动者》羊城创刊 陈独秀广州应聘·····	(112)
第三十回	罗易赴国际“二大” 代表议列宁《提纲》·····	(127)

第三十一回	作特使马林来华 接通知代表赴会·····	(139)
第三十二回	共产党“一大”举行 法巡捕会场骚扰·····	(156)
第三十三回	画舫轻歌续大会 南湖烟雨定《党纲》·····	(172)
第三十四回	陈独秀主持党务 李启汉领导罢工·····	(185)
第三十五回	润之安源播火种 隆郅路矿闹工潮·····	(200)
第三十六回	京汉路潮起潮落 吴佩孚如疯如狂·····	(218)
第三十七回	赤山约彭湃组会 海陆丰农友抗租·····	(234)
第三十八回	张国焘关外偷渡 远东会国共同席·····	(250)
第三十九回	促合作马林置腹 论时局仲甫推心·····	(266)
第四十回	李大钊西湖息争 张国焘“三大”落选·····	(279)
参考资料	·····	(296)

第二十一回

北大红楼传真理 亢慕义斋译文章

1920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古老的北京城完全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城里店铺早已关门，街上人迹罕见，显得冷清极了。偌大一个都市，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位于东城的马神庙公主府的当年北京大学所在地。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辟出这块地盘办起京师大学堂。后来，随着建校规模的扩大，北京大学原校舍不够用，又向北河沿和汉花园（即今沙滩）发展，不过北大大部分学生的食宿和其他活动仍在这里。

这一天正值新学期开始，新生入学，老生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充满朝气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起谈天论地，欢声笑语犹如一股初春的和风，从冰冷的古都吹过，使人感到一丝暖气。

在西斋学生宿舍的一间寝室里，一群学生正围在火盆前，分享着从家乡带来的土特产，闲聊假期中所见所闻的新鲜事，盆里的炭火映红了一张张稚气的面孔。忽然，有人大声道：

“各位知道否？本学期我们学校正式破例招收39名女生入文科旁听，这条消息见报了。”

大家的目光朝“新闻发布人”投去，这说话人不过20出头，衣冠整齐，头发剪成学生式，稚气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姓商名章孙，广东番禺人，其父商衍鎏系清朝光绪年间翰林，是名噪一时的国学大家、书法家和国画家。章孙的大哥

是研究德国文学的专家，二哥是史学和考古学专家，都年轻有为。章孙两年前考入北大，现是德文专业二年级学生。大家听他一说，话题就转到男女同校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

原来，辛亥革命后，在男人剪辫子、女人不缠足的同时，教育上也有个进步，就是各地都办起了女子学校。但是，除了民国元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订学制，实行过初级小学男女同校之外，一直到1920年初，全国中学和大学都没有男女同校的。这样一来，许多女子要求深造的机会无形中被剥夺。同时，由于在学校、社会乃至一般娱乐场所中，男女之间依旧被封建主义的藩篱严实地阻隔着，造成男女正常交往的极大不便。对此，北大学生是颇有感触的。五四运动前夕，为了串连女同学一起闹学潮，北大曾派出一群男生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去，但他们还没进门就被挡住。后经反复交涉，校方才安排一间很大的房子以供来访的男士和女高师的“闺秀”们见面。见面时，在大屋子的中间坐着几名年老的女学监，起“界隔”的作用，再一头坐男生，一头坐女生。因为房子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只得请隔夹在中间的学监传达。这就是当时男女生相处的情形。

蔡元培是提倡女权的先觉者之一。他顺应世界潮流，合乎人群期待，不顾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着手打破数千年封建藩篱，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先河。1919年底，他在接到邓春兰等女青年，尤其是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请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的信后，便在报纸上公开声明说：“欢迎女青年投考北大，程度及格，亦可录取。”果然，1920年新学期，北大就录取了王兰、邓春兰、韩恂华、赵懋云、赵懋华、赵寿壁、程勤若、奚湔、查晓园等9名女生入学旁听。此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

能和女生同校同教室读书，男学生可乐了，大家兴奋得说个不停，寝室里像开了锅一样。

一个把小时过去了，大声的陈述和争辩渐渐停息下来，这时同学们才注意到以往在这种热闹场合总是扮演主角的邓康此时默然无言，双手托颊，若有所思。

邓康（中夏），生于1894年，湖南宜章人。其父是清朝举人，当过省参议员、县长，旧学根底很深。邓中夏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还写得一手好字。1917年，他随父亲到北京，秋天考进北京大学文学系。到北京不久，十月革命的惊天炮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到中国，本来就关心国事民瘼的这位来自湖南南部的青年，一下子就被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不久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的追随者。

这时，邓中夏见同学们疑惑不解的一双双眼睛瞧着自己，便站了起来。他先从国际形势讲起，深入分析了国内状况，探讨了新时代青年肩负的社会责任，最后落脚到国民社当前面临的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条分缕析，字句铿锵。同学们听得十分认真，屋里一点杂音也没有。

原来国民社和新潮社一样，都是“五四”前夕涌现出来的社团，成员主要是北大学生。这两个团体在青年中具有全国性影响，是新青年派的有力助手，新文化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又各有特色，国民社注重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把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政治当作首要任务；新潮社的旨趣则在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考据方面，主张社会改良和渐进发展，着重于文化思想方面反封建的启蒙活动。“五四”运动后，国民社的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更加关注，并在北大图

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仰慕者。而新潮社的学生则以胡适为首领，倾向于纯学术的国故整理运动。两大团体因旨趣不同，矛盾实难避免。

邓中夏发言时表情严肃认真，他刚理的平头，竖立的头发，和刀切斧砍般的面部轮廓，给人一种阳刚有力的印象。讲到激动之处，只见他紧攥拳头，声音也激昂起来：

“同学们，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传统，与社会上恶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在北大，我们一定要与新潮社那帮人争地盘，大力宣传我们的主义，提高广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我们周围，发展和壮大国民社……”

邓中夏一讲完，屋里的学生便展开了讨论。大家很重视他的意见，商量出一套巩固和发展国民社的办法。但同时又感到，随着“五四”之后新的问题出现，理论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能包医百病，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知之甚少。这该怎么办呢？……此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导师李大钊先生。

北京东城汉花园迤东的沙滩大街路北，矗立着一座4层的红砖砌成的大楼，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红楼——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红楼是在1918年，即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建成的。红楼的第一层，即最下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李大钊是1918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的。红楼建成后，图书馆迁此，他就在东南角一间房子里办公。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代，李大钊在红楼高擎火炬，照亮了广大进步青年的心。

近一个时期，李大钊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看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在中国知识界中逐渐传播开

来，许多有志青年如饥似渴地寻求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谈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乘机流传起来。这就如同久壅的水渠，一旦开放，未免泥沙俱下，旁流杂出。而一部分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很不系统，故而对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则，新文化阵营也出现了裂痕，胡适等人公开起来反对和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的风暴刚刚过去，新文化阵营的骁将胡适就起来检讨这场运动的所谓“激进”。他以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用实验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这位博士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面，刊登了自己的大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读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认为原则问题无让步余地，遂决定公开应战。8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与知识界的右翼代表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而且“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并驳斥胡适说：“必须有一个